

军事历史研究

十年论文精选

(1986—1996)

军事科学出版社

序

《军事历史研究》自1986年创刊以来，已经度过了十个春秋，走过了一条艰苦创业、开拓前进之路。

唐人贾岛的《剑客》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军事历史研究》磨砺十载，虽未公开出版，却“雪亮闪烁”、“遐迩中外”。

这是学界瞩目的一份高品位、高质量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

这是一块大容量、大跨度的学术园地。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大凡古今中外的军事科学领域，包括军队建设、战争战役、军事思想、国防理论、军事制度、军事人物、军事学术等，在这里均有所涉猎。

十年之中，《军事历史研究》共编纂出版了四十册、一千余万字的学术成果，凝结着众多的大家巨擘、学界新秀的智慧与心血。他们以博古通今、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以闳中肆外、字字珠玑的呕心沥血之作，为《军事历史研究》添光增彩，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宝库奉献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学术瑰宝。

《军事历史研究》创刊十周年之际，正是新旧世纪交替之时。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开创军事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更好地为军队建设和国防事业服务，我们从这洋洋千余万字的学术成果中精选了近四十篇、五十余万字，汇编成册，作为一份礼品，献给新的世纪，献给学界同仁，献给广大读者！

该书为《军事历史研究》十年之精品，内容包括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探源到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研究；从《孙子兵法》精义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新论；从古长城国防价值的评估到近现代国防思想的构想；从对世界大战的回顾与思考到对太平天国农

民战争乃至金门炮战等的评述；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探索到中西军事思想的比较研究，等等。史料翔实，立论新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军事历史研究十年来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不仅为军事史方面的教学工作者、科学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一部专业论著，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学习军事历史、军事思想的可靠读物。

然而，在编辑过程中，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好中选优，不少长文也只能忍痛割爱，实属遗憾！

作为军事历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本书的出版，得到了空军政治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军事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军事历史研究》编辑部同仁的具体合作。军事科学出版社张健总编辑亲自审阅了全部书稿，所有入选论文的作者都给予了密切配合。这一切都为本书的问世创造了条件，这一切也必将在军事历史学科建设的日志上留下值得称誉的一笔！

编 者

目 录

序	(1)
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初探	吴 瑾 吴信忠(1)
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科学体系和 历史价值	单秀法(17)
试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中国化	张家裕(36)
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	傅 鸣(55)
关于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 的几个问题	尚金锁(75)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刘继贤(85)
论毛泽东战争认识辩证过程的重要思想	夏征难(103)
▲毛泽东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科学方法	张 健(125)
吸取兵法精华 丰富战役理论 ——刘帅独具慧眼的“兵势”新论	吴如嵩 毛元佑(135)
粟裕指挥艺术的精髓——唯物辩证法	奚 原(146)
研究我军建设史 促进军事改革和现代化	姜思毅(170)
建国以来我军建设的几个规律性问题探讨	傅立群(178)
我军党委制的历史考察及启示	公方彬 蔡志强(192)
论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政治工作历史经验	林登泉(213)
金门炮战述论	余子道(230)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探源 ——《周易》“师左次无咎”与《尚书》六誓 的军事观	李际均(259)

△ 中国古代军事预测述要	黄朴民(265)
△ 中国古代军事谋略思想探讨	袁德金(283)
△ 古长城的国防价值再评估	姚有志 毛振发(295)
△ 《海国图志》与晚清国防近代化	施渡桥(310)
△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论纲	史滇生(324)
△ 试论太平天国的军事思想	张一文(343)
△ 论太平天国后期所发动的几次重大战役 的战略意图	朱哲芳(361)
- 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统帅机关的决策幕后	杨立强(381)
汪伪“和平救国军”的建立、发展和消亡	石源华(395)
一支特殊的民族军队——藏军	曹振威(424)
对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主要原因的再思考	彭训厚(452)
“菲力克斯”：一个没有兑现的作战计划 —兼论伊比利亚半岛在纳粹德国军事战略中 的地位	金重远(470)
英布战争原因探析	关勋夏(478)
△ 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观念与军事近代化刍论	皮明勇(493)
△ 中西军事思想的交流与互补	刘 庆(509)
△ 关于军事认识论研究的构想	张家驹(523)
△ 唐代兵书及其军事伦理思想	王联斌(544)
△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思想	刘先廷(558)
△ 《战国策》谋略思想析要	于汝波(584)
△ 《湘军志》钩沉	祁龙威(601)
△ 略论吴起与《吴子》的军事思想	王式金(613)

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初探

吴 瑛 吴信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军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军队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国际战略格局、战争与和平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和军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治军之道，逐步形成了新时期的建军思想。几年来，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工作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创了我军建设的新局面。认真学习、研究邓小平新时期的建军思想，是理论战线和我军中、高级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军建军史上的新阶段

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邓小平关于新时期的建军思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理论同我军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5年提出“军队要整顿”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是新时期建军思想初步提出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一起，一方面致力于拨乱反正，清除十年内乱中林彪、“四人帮”对我军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恢复我军光荣传统和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另一方面，对我

军建设开始提出一些新的重要方针、政策和部署。1975年初，邓小平于危难之际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并参与军委的领导。他不顾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压力，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旨在先从调整领导班子着手，使军队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性强、作风正、团结好的人手中，解决好“肿、散、骄、奢、惰”问题，进而对军队进行全面整顿。这是邓小平为扭转“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军队工作混乱局面，恢复我军的光荣传统，提高部队战斗力，首次提出的军队建设拨乱反的重大战略决策。虽然“后来由于遇到曲折，停了下来”^①，但这次整顿，仍然使军队建设得到了加强，部队工作有了明显的改进。

1977年和1978年，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邓小平重新担负起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之后，继续抓紧军队的整顿，调整军队的各级领导班子，并提出“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②；恢复和创办军事、政治、技术专业院校；部队干部要年轻化；要把军队建设成一个大学校。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对整顿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会议提出和通过了全军的十项战斗任务和九个决定、条例，“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③这样，邓小平以整顿为中心建设军队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显露了他的新时期建军思想的萌芽。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是新时期建军思想基本形成的阶段。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④。我军建设向着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迈进。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邓小平在军队建设方面进一步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一是强调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而“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⑤把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当作决定军队命运的战略问题。二是强调“消肿”，“要解决军队机

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⑯，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三是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错误思想倾向。“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⑰要从理论上打下根底，大讲精神文明，好好宣传“四有、三讲、两不怕”，等等。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9月19日，邓小平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作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人民军队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透彻地阐明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根本任务，是一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十二大以后，在开创军队建设新局面中，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1982年年底，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开创军队建设的新局面，“最中心的问题，就是领导班子年轻化。”^⑲1983年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重要思想。他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以及实现总目标的对策的途径，教育训练、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了科学的论述。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第三阶段，从1985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来，是新时期建军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阶段。其主要的标志，就是实行了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邓小平高瞻远瞩，经过多年观察，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如果工作做得好，大战可以避免”^㉒。根据这个科学判断，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这一总口号的提出，使我军从过去只重视常备军建设转到常备军、后备军、后备力量和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军事理论、现代国防观念等国防总体力量的建设上来。这就从指导思想上为我国军

队建设和国防建设走上新的轨道提供了根本保证。

邓小平在三个阶段所阐述的思想和理论，虽然每个阶段的侧重点不同，但又是互相交织、互相连贯的，前一阶段往往是后一阶段的必要准备，后一阶段则是前一阶段的继续、充实和发展。邓小平的新时期建军思想，指引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进程，是我军建军史上的新阶段。

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军理论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的形成过程，生动地反映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建军理论正确的、科学的运用。邓小平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曾参与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这一伟大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又提出军队建设新的指导思想、方针和原则、目标和任务等，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建军理论，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的瑰宝。他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新论断，断然实行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总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它的正确与否，是军队建设成败的关键。而正确指导思想的理论依据，很重要的取决于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国际战略格局，尤其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科学分析和判断。当前美、苏(现已解体，改称俄罗斯)两个超级大国，积极推行全球战略部署，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双方的军事力量处于相对均势，彼此都拥有毁灭对方的能力，但谁也不敢贸然先发动世界大战，谁也不肯停止军备竞赛，双方争夺处于僵持的局面。第三世界不希望战争，西欧、东欧各国不愿打，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不愿打。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正是基于对这种国际形势的长期观察和深思熟虑，邓小平

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和我国对外政策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转变”的思想,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特别是论述暴力革命理论和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经验中,提出和阐明了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许多重要指导原则,创立了无产阶级建军理论。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实践,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支无产阶级军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军学说。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他们都没有提出过在和平时期如何建设军队的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中国的国情和战争实际出发,深刻地研究了战争规律和人民革命战争条件下军队建设问题,对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国以后,毛泽东虽然也开始研究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问题,但是,他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和估计有失误,不适当强调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甚至认为大战一触即发,以致“时刻准备打仗”,一直成为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对于如何在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建设我军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高超的马列主义水平,敏锐的洞察力和革命胆识,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经验,科学地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早在1975年,他就讲大仗五年打不起来,1980年和1984年,又重申了这一观点。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这样,改变了过去那种总认为大战迫在眉睫、随时有可能爆发的不正确判断,提出了抓紧时间,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国际环境,“放胆地一心一意地来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⑩这样就纠正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左”的认识,使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由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轨道上来。同时,邓小平还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战争因素甚至还会增长。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害怕战争,只是尽力制止战争因素的发展,争取更

长的和平时期。由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正确判断，调整了对外政策，改变了过去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使我国从“一条线”、“两角争”中，变成了真正的三角中的一角，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和解决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建军史上一个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建军理论的杰出贡献。

(二)强调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制定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总方针。

在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上，邓小平的一大创造就是强调国防建设不仅要服从于、而且要服务于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是军队建设的物质基础。军队建设的目标、规模、速度和现代化程度，无一不受经济建设的制约。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国家的防御能力、军队的战斗力和对战争的承受力，比以往更加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种依赖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求得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同步发展。这是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恩格斯说过：“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⑩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书中，也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作了明确的阐述，指出：“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⑪，还说如果是真正想要原子弹的话，就得“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⑫。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这些正确的思想没有完全付诸实践，我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从而使军队现代化建设损失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

邓小平坚持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的思想，并且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处理八十年代存在的国防建设上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最终提出了符合中国特点的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这就是：军队建设在国家建设大局下行动，在忍耐中发展。

邓小平从分析现阶段我国基本矛盾入手，坚持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点上运筹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的理论原则具体化了。他在肯定军队建设不能放松的前提下，强调富国才能强兵，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他辩证地阐述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与其它三个现代化的关系，指出：“四个现代化，其中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三个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在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上才有可能。”^⑩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硬着头皮把国家经济搞上去，等到国家经济发展了，国力大大增强了，搞国防现代化就容易了。他把国家经济建设作为大局，把军队建设作为局部，再三强调军队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⑪在国家经济还不富裕，军费不可能很大增加的情况下，要求军队准备“忍耐十几年”^⑫，尽可能减少军费开支，适当降低军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重。根据这个精神，中央作出了军队员额减少一百万的正确决策，“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⑬，并适当削减了国防投资，减轻了国家的负担。

邓小平关于“军地两用”、“军民兼容”的思想，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服务于国家建设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从理论上、实践上补充和丰富了毛泽东建军思想。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生产队。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是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提出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从战略的高度，坚持和发挥这一思想，第一次提出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还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怎样服务？主要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国防现代化的一个创举。邓小平指出：“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不仅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同时又适

应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既是军队直接为国家建设服务，又是对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种人才的智力投资。二是军民兼容。他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⑩，并具体要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海军可腾出港口，搞民用或军民合用；国防工业要“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⑪，把武器装备和科研生产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使军品民品生产不发生冲突，相互协调发展。军队坚决贯彻了邓小平这一思想，积极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为加速国家经济建设贡献力量。现在，过去那种“养兵千日，用兵一日”的传统观念，正在被“养兵千日，用兵千日”的新观念所替代。

“军队要忍耐”的思想不是消极的，它包含着“在忍耐中发展”的思想。从现实情况看，邓小平提出“忍耐”思想后，军队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设军队的光荣传统，大力发展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逐步实现了“自己动手，补充不足”。更重要的是，“忍耐”推动着改革，更新着军队各级领导的治军观念，由单纯讲数量转变为重视讲质量，由单纯讲速度转变为重视讲效益。按照精兵、合成、平战结合和提高效能的原则，对军队实行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减少一千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⑫。邓小平还指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⑬，到本世纪末，“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⑭。我们若把邓小平关于如果工作做得好，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话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就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强大的经济力量同时具有两种作用：一是“不战而胜”的有效威慑力量，在一定意义上讲，同样可以起到遏制战争的作用；另一种是发展国防建设的“后盾”作用。所以说，军队建设在暂时“忍耐的内核中”正孕育着发展。

（三）明确“三化”以现代化为中心，规定了和平时期全面建设

军队的总目标。

以现代化为中心,以“三化”为总目标全面建设军队,这是邓小平新时期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时期我军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回答和解决了军队建设中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在建军目标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沉痛的教训。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在强调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建设军队的同时,也从来没有忽视从武器装备和技术上建设军队。毛泽东早就指出:没有现代化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军长期处于装备低劣、编成不正规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我军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正确口号,我军开始进入了以掌握现代化技术为目标的建军阶段,后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先是在五十年代吃了两个亏:一是反对正规化,二是反对“教条主义”,延误了军队建设;随后到了六十年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用“一化”(革命化)代替“三化”,而且愈演愈烈,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精神万能”,军队建设遭到极大的破坏。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明确提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并且第一次指出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来搞好军队建设,从根本上否定和摒弃了长期以来建设军队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完成了我军建设方向上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体现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的思想,从根本上理清了“三化”间的辩证关系。革命化体现我军的本质,是我军区别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主要标志,是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前提和政治保证,正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程度越高,越需要正规化,没有正规化,也就没有现代化。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统一整体。而现代化则是我军建设的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

强调和坚持以现代化为中心，深刻反映了现代战争对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是现阶段解决我军建设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当代局部战争的实际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充分表明，军队现代化程度对军事实力和战争结局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美苏世界军事强国的军备竞争，主要是现代化水平的竞争。为此，他们都把越来越多的国防经费投入到研制发展新武器和提高军队科学技术水平上。国外有的军事专家甚至预言，未来战争的胜利，将取决于谁拥有最尖端的武器和科学技术。美国著名国防经济专家J·希奇曾断言，在特别情况下，聪明的运筹能使一支部队的某种能力增加三倍至十倍，而尖端武器的发明则往往能使同一种能力增加十倍至一千倍。此言显然夸大了武器的作用。但军队现代化程度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对我军现代化建设是一种挑战和压力。现代化的科学含义的解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武器装备，这是物质基础；二是人，就是使用现代武器的人，包括干部培养和部队的教育训练；三是把人和武器结合起来的方式，这就是要有科学的编制体制。以现代化为中心建设军队，就是要通过全党全军的努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里，使我军在武器装备、人员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战术素养、部队科学编成等几个主要方面的现代化程度，接近或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或军事强国武器力量的水平，大大提高我军应付现代战争的能力。

(四)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揭示了和平时期增强军队战斗力的基本规律。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的教育训练，并把“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列入十大军事原则。建国以后，我军的教育训练，长期处于临战状态上的应急性训练，而且水平不高，基本上停留在“三单训练”(单一兵种、单个人员、单纯军事技能)那种低级、低层次循环之中。五十年代末，“左”的错误殃及军队教育训练领域，“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鼓吹“练得越多、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远”，公开推行取消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致

使我军教育训练蒙受极大的损害，造成部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军队教育训练中的历史经验，按照现代战争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针对和平时期军队教育训练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军队教育训练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系统的论述。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鲜明地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位置上加以考虑。”1977年8月，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军队过去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现在不打仗，必须通过办学校，从教育入手，来考验干部，培养干部，提高军队素质，提高军队战斗力。强调“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把它作为我军建设的“一个原则”和“方针”，要求各级把“这个方针具体化”。1980年3月，邓小平针对有些单位教育训练不落实的状况，严肃地指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②。他十分重视加强军队院校建设，强调“要办好院校”，要把优秀的干部、战士送到院校去学习。“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③。要使院校起“集体干部部的作用”^④；要选优秀的干部去办院校，要抓好教材建设。要把新的技术装备优先配发给院校，要舍得花一些钱。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及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邓小平又多次提出：“努力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⑤，“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丰富了教育训练的内容。

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深刻地阐明了教育训练的重要性，揭示出和平时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基本规律。

这一规律表明，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处于全局性的地位，除非在战争环境下，这种地位是长期的、稳定的、巩固的。这一规律反映了我军建设实际和客观要求。从未来战争的需要来讲，现代战争武器先进，手段多样，诸军兵种联合行动，立体作战，且作战方式多样化。敌我双方斗智斗勇斗装备，胜利非训练有素的军队所莫属。因此必须十分重视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

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讲，“多才之旅必胜”。从我军现阶段状况看，与军事强国相比，武器装备明显处于劣势，况且在较长时间内还不能根本改变。欲“以劣胜优”，必先通过训练，提高人的素质，实现旧的武器新的战法，在政治思想上过得硬，在技术、战术、指挥上高敌一筹，以智取胜。而且目前抓紧人才的培养，也是为今后掌握现代化装备作好人才准备。一旦我们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就可以很快很顺利地实现人和武器的新的结合。再从“四化”全局来看，在相对和平时期，军队训练的功能由过去“练为战”单一功能变成了“练为战”与“练为建”（训练为国家建设服务）两者兼容的双重功能。军队的教育训练作为整个国家教育的一部分加强了、发展了，无疑将对四化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我军的教育训练工作。几年来，训练领域不断扩大，从军事训练发展到军、政、文、体、民“五位一体”，形成了一个大系统；训练体制日趋科学，训练内容逐渐深化；训练手段也有所革新；国防经济学、军队管理学、心理学等新兴学科已经渗透到军队教育训练之中，有效地推动着现代化、正规化的发展。

（五）坚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改革政治工作，为和平时期建军提供了根本保证。

政治工作，是我军区别于其它军队的根本标志，是我军的真正优势。为了使和平时期人民军队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邓小平十分关注我军革命化建设问题，高度重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建设。

军队政治工作要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改革创新，是邓小平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既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政治工作是我军固有的优势，“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又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②。因为“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最大的不同。我们政